



加拿大的外交政策是什么？在过去的60年间它又有哪些变化？

本书以自由国际主义、边缘依附论和复合新现实主义为三大理论基础，采用了最新的文献与资料，历数二战结束以来各届加拿大政府的外交政策与外交风格。作者从外交理论、外交实践和外交决策这三大角度，全面阐述了加拿大外交政策在过去的60年间的发展与变革，为中国学生、学者、政策制定者以及读者提供了最新、最系统的当代加拿大外交理论和外交政策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文本。

上架建议：国际关系、外交

ISBN 978-7-208-15579-4



9 787208 155794 >

定价：98.00元

易文网：www.ewen.co

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丛书

主编 郭树勇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

加拿大外交理论与实践

[加] 约翰·J.柯顿 著

John J. Kirton

陈金英 汤蓓 徐文姣 译

钱皓 校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加拿大外交理论与实践/(加)约翰·J.柯顿
(John J. Kirton)著;陈金英,汤蓓,徐文姣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丛书)
书名原文:Canadian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
ISBN 978-7-208-15579-4

I. ①加… II. ①约… ②陈… ③汤… ④徐… III.
①外交理论-研究-加拿大 IV. ①D8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84683 号

责任编辑 史美林

封面设计 杨钟玮

加拿大外交理论与实践

[加]约翰·J.柯顿 著

陈金英 汤蓓 徐文姣 译 钱皓 校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28
插 页 4
字 数 446,000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579-4/D·3324
定 价 98.00 元

作者简介

约翰·J.柯顿 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蒙克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研究院八国集团/二十国集团项目负责人，二十国集团研究组联合负责人，全球卫生外交项目研究组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

校订者简介

钱皓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加拿大研究会副会长。2013年10月20日获加拿大总督戴维·约翰斯顿在上海亲自颁发的“总督奖章”。

译者简介

陈金英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市“浦江学者”。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

汤蓓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上海市“晨光学者”。研究方向为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

徐文姣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加拿大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加拿大与全球治理。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丛书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eries (SISS)

主编：郭树勇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拼音排序）

陈志敏 冯庆华 胡礼忠 贾庆国 姜 锋 李岩松 刘中民
钱 皓 苏长和 汪 宁 杨 力 朱威烈

编辑委员会：（以姓氏拼音排序）

晋继勇 刘宏松 马 骏 谭再文 汤 蓓 汪段泳 王联合
武心波 杨 成 张绍铎 左 品

此课题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重大课题“中等国家的软实力研究：以加拿大为例”终期成果之一，项目编号为：2013114ZD002。

中文版序

本书为中国学生、学者、政策制定者以及读者提供了最新、最系统的当代加拿大外交理论和外交政策方面的专业知识,也为那些母语为中文的加拿大人和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华裔提供了关于加拿大外交领域的文本。

本书有三大主要目标。首先,通过对加拿大外交政策学说的考释以及对历届总理的重大决策和国际资源配置的审视,向读者提供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联合国成立以来的现代世界秩序下加拿大历届政府的对外政策。本书采用了最新文献和资料,包括对斯蒂芬·哈珀领导的保守党对外政策的完整梳理和分析,以及对自由党总理贾斯廷·特鲁多执政第一年的外交决策的分析。

其次,通过分析自1945年以来73年间推动加拿大对外政策的国内行为体和各种力量,以及限制和塑造对外政策的外部决定因素,详细观察对外政策何以产生,以及历届政府的外交追求。

由于加拿大是英法双语国家、多元文化社会和联邦政治体系,本书详细分析了每一位总理的对外政策是如何因其个人信仰而决定,以及涉及对外政策的相关部长、外交部门、机构、省级政府、社会因素、商务和劳工团体、利益集团、议会、政党、选举、媒体和公众舆论在对外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作用。因此,本书也是关于加拿大政治和政策的专业著作。加拿大拥有高度开放的社会和经济,它很像中国、美国以及俄罗斯那样的大国,其国内政策也是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开放”使一系列外部决定因素变得尤为重要。首先从加拿大的相对能力和脆弱性入手,这些相对能力和脆弱性在世界上那些主要国家中的分布发生了变化。此处所说的这些主要国家差不多总是包括加拿大的两个超级邻国——美国和苏联/俄罗斯,还有法国、英国、欧洲以及加拿大在英联邦和法语国家组织中的伙伴国。

本书的研究进路始于美国学者威廉·福克斯(William T.R. Fox)所创

建的“超级大国”的概念。加拿大是横贯北美大陆、面临三个大洋(大西洋、太平洋、北冰洋)、空基和核武器时代下世界政治中仅有的三大国家之一。因此,加拿大地理上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同时,从广义上说,本国不断增长的华裔和亚裔加拿大公民也将加拿大打造为一个亚太国家。总而言之,加拿大是全球性国家,并在全球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有鉴于此,对从事加拿大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生和学者,以及那些关注加拿大本国的学者或读者而言,本书具有专业参考价值。

第三,本书依据三大主要理论来解释和评价加拿大对外政策。这些理论以不同形式主导了过去一个多世纪的政策辩论和学术研究。第一种理论是自由国际主义,认为加拿大是一个中等国家,与其他类似的中等国家一起利用和建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第二种理论是边缘依附,认为加拿大是一个小而具有依附性的国家,依赖并深受美国影响,尤其在外交上追随美国。第三种理论是复合新现实主义,认为加拿大是当下权力分散的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大国。在世界秩序的塑造中,加拿大广泛参与并拥有合作伙伴和影响力,从而促进和宣扬了加拿大的国家利益及其独特的国家价值观。

本书是在笔者自1974年执教以来撰写和出版的关于加拿大对外政策的大量文稿基础上修订而成,其中《作为主要大国的加拿大》(*Canada as a Principal Power*, 1983)和《世界变革中的加拿大对外政策》(*Canadian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 2007)是本书的主要借鉴内容。当然,笔者撰写的有关全球治理方面的诸多著述也丰富了本书的内容,尤其是《二十国集团与全球治理》(*G20 Governance for a Globalized World*, 2013),该书中文版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

在本书撰写和组织翻译中,我得到很多朋友的鼎力帮助。中国方面,中国加拿大研究资深学者、上海外国语大学钱皓教授发起并与我共同设计了此翻译项目。在几度面临重大挑战时,她坚持并组织了翻译团队,确保了本书的翻译质量和最终的出版。陈金英、汤蓓、徐文姣高质量的翻译技巧和清晰的文字给本书增色良多。我的那些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朋友和同仁在郭树勇院长领导下,在开拓两校的全球治理学术合作计划方面给予了持之以恒的支持。上海人民出版社辛勤、高效的团队工作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加拿大方面,我非常感谢多伦多大学全球治理项目执行主任马德琳·

科克(Madeline Koch)的优质工作。诚挚感谢参与此项目的首席研究员王馨荷(Aliisa Wang)和其他助理研究员。感谢那些参加我为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三年级学生开设的加拿大外交政策课程的学生,他们的兴趣和真知灼见不断地丰富了本书的内容。

家庭方面,我非常感恩数年来一直耐心、理解并支持我的妻子玛丽(Mary)。特别感谢我的儿子米歇尔(Michel)和他的妻子乔安娜(Joanna)以及他们的孩子嘉雯(Charlotte Hope Kirton)、嘉桐(Gabrielle Kimberly Kirton);女儿琳达(Linda)和她的丈夫丹尼斯(Dennis Maplazi)以及他们的孩子埃兹拉(Ezra Ayanda Xavier Maplazi)。

谨以此书献给过去、现在、将来致力于研究加拿大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的上海外国语大学、多伦多大学以及遍布全球的中国学生。

约翰·J.柯顿

2017年6月于多伦多

译者序

值此译著付梓之际,思绪万千,竟一时不知从何谈起。

2004年我有幸获得中加政府间签订的最高学术类项目“中加交换学者”(CCSEP),在多伦多大学东亚系访学10个月。其间,由于我的研究方向是加拿大外交,我时常去多伦多大学“芒克全球事务研究院”(时称芒克中心, Munk Centre)听讲座,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也结识了一群来自各大学的资深教授,建立了紧密的学术关系。2005年回国后,我非常希望把加拿大外交研究领域的学者和书籍推介给中国学术界,但苦于经费短缺,无法实施。

2006年,在时任加拿大驻华大使馆文化处资深官员王荔女士的建议下,我申请了“加拿大研究发展项目”下的“访问教授资助”子项目,并获得加拿大外交部的批准。有了这笔资金,我随即行动,邀请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约翰·柯顿(John J. Kirton)教授和芒克中心的亚洲研究所所长黄一庄(Joseph Wong)教授来我院访学两周。柯顿教授于2007年12月中旬抵达上海,启动了他中国访学的处女行。此时,柯顿教授的新著《世界变革中的加拿大对外政策》(*Canadian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刚刚由汤姆森·纳尔逊(Thomson Nelson)出版社出版。应我的请求,柯顿给我校加拿大研究中心图书室赠送了一本。在接下来的两周访学中,柯顿除在我校做了三场公开演讲和开设答疑工作时间(Office Hour)外,还在我的安排下前往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和苏州大学做了三场公开讲座(此资助项目要求被资助者必须至少在三所中国大学做公开演讲)。当时柯顿已经担任芒克中心的八国集团/二十国集团项目负责人,因此他的演讲都是围绕“二十国集团与全球治理”主题。但那时的中国学界和政界对“二十国集团”普遍认识不足,柯顿的公开演讲并未获得适度的重视和媒体的关注。然而,时任我校副校长张曙光教授敏锐地意识到“二十国集团”研究不久将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增长点和智库热点项目。为此,张副校长亲自会晤了柯顿教授,

并就上海外国语大学与多伦多大学“八国集团/二十国集团”项目组的合作签署了备忘录,其中第10条(应我的请求)则是合作翻译柯顿的这本关于加拿大外交的新著。

备忘录签署后,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多伦多大学在二十国集团方面的学术合作开展得非常顺利,原我院朱杰进副研究员随后访问了多伦多大学八国集团/二十国集团中心,并在2009年作为中方学术代表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八国集团峰会,后他成为上海学术界二十国集团研究专才。2010年柯顿教授被我校聘为客座教授,校政治学博士点的学生也陆续进入多伦多大学八国集团/二十国集团研究中心学习。然而,关于此专著的翻译工作却一直没有任何进展,一是该宏著篇幅庞大,约60多万字(中文)的翻译我一人无力承担;二是我也不愿召集研究生承担翻译工作,唯恐翻译质量不尽如人意。虽也曾计划与武汉大学的潘迎春教授合作翻译,但终因各自的工作繁重而一拖再拖。2013年,我院陈金英副教授申报CCSEP项目,经与柯顿教授商量,陈金英以此翻译项目进驻了多伦多大学八国集团/二十国集团项目组。由于此时离该专著公开出版已有6年之久,加拿大内政和外交也发生了许多变化,经与柯顿教授商量后,在保留并更新原著的理论部分外,柯顿特别为母语为中文的加拿大外交和国际关系方向的学生和学者重新整合、撰写了这本专著。

本书的翻译团队由陈金英副教授、汤蓓副研究员、徐文姣博士以及我本人组成。依据各自研究所长,具体翻译分工是:陈金英负责第1、11、13、14、15章;汤蓓负责第2、3、4、5章;徐文姣负责第6、7、8、9、10章。全书由我进行了二稿的全面审校,以确保翻译文本与原稿的高度贴切、准确和通达。在征得原作者的全面授权后,我依据此书稿的内容将此译著的书名定为《加拿大外交理论与实践》,并在目录章节上做了全面调整,将全书分为三大部分,即:外交理论:一种分析框架;外交实践:加拿大对外政策;外交决策:程序与影响因素。与此同时,为保持目录的对称性,我也相应地对原稿的每章标题进行了文字微调。同时,针对翻译稿中的部分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术语、概念等,由我统一补加了“译者注”。

此书的校定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中既有令人头痛之处,也常有会心一笑。三位翻译者风格各有千秋,翻译文字花絮颇多。汤蓓为政治学科班出身,因而理论部分翻译由她担纲。除确保理论的翻译到位外,汤蓓的“信”做得最好。她对每一个连接词、转折词和感叹词都给予了恰当的翻译,最大化

地尊重和保存了原作者的“原汁原味”的写作风格。同为科班出身的陈金英,其翻译则“老道”而“圆润”,很多时候以见一斑而窥全豹的方式对原稿进行了整合性翻译。在校定时,我在确保没有扭曲原著的原意下,尊重了译者这种以“达”为重心的翻译风格。徐文姣则是渐入佳境型译者,五章的翻译提升了她对加拿大外交史融会贯通的能力,可喜可贺。此外,在校稿中,对一些核心外交概念或术语,如何给出准确且符合原文实质内容的中文有时真是颇费脑筋。如原文中的“Niche Diplomacy”(中文中也有按音译的“利基外交”一说)是加拿大外交中一个最重要的外交选项,汤蓓的译文是“恰位外交”,陈金英的译文是“小众外交”(从此二译文中也可看出两位不同的翻译风格),虽二译文似乎都可以,但与加拿大选取此外交路径的实质内容仍有些差距。2015年10月,我在加拿大圣玛丽大学访学,借此机会,我与三位精通中英文和外交学的学者反复切磋,最终一致同意将此译为“定位外交”(关于此“Niche Diplomacy”的具体含义,请参见文中“译者注”)。另一词则是“Functionalism”,这也是理解加拿大外交的关键词语。国内学界既有译为“功能主义”,也有译为“机能主义”,但均未能完全译出原意。如若借用语言学的功能理论的约定俗成翻译,此可译作功能主义,但这仍与1943年7月9日加拿大麦肯齐·金总理在众议院所作的“Functional Principle”讲话内容有悖,也与加拿大版“实用主义第一”(Functionalism First)含义有差距。“Functionalism First”最初是1943年由戴维·米特拉尼(David Mitrany)在其广为流传的《有效的和平体系》(A Working Peace System)报告中首次提出。最后,在充分分析加拿大语言特点——即适当与美国英语保持差异,我将此翻译为“务实主义”,以区别美国英语中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此外,关于一些鲜为人知的术语如“纸上公民”(Canadians of convenience),它是指那些移民在获得加拿大国籍后又返回母国长期居住的双重/多重国籍者,在修订中,除添加必要的译者注,我也将原文置于译文后的括号中,以便读者明辨。凡此种种,余不赘述。

“好事多磨”是我对此译著面世的真实感慨。2017年3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将此译著列为2017年专著出版资助目录,交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但此时加拿大自由党领袖贾斯廷·特鲁多已经就任总理一年多了,中加关系也出现了较大的突破,双边实现了总理互访并建立了高层年度对话机制。为确保此书内容的时代性,我再次请求柯顿教授补充了“贾斯廷·特鲁多政府时期”这一章,并由我本人翻译完成(第12

章)。同时,柯顿的中文版序也一并由我译出。

感谢原著作者约翰·柯顿教授对我翻译团队的无条件信任和支持。无论何时,柯顿总是在第一时间回复我的来信。我常常发现他的回信是在多伦多早上5点多钟,他的勤奋、执着以及对学术的那份挚爱我感动,使我在校稿中不敢有任何倦怠,即便发生眼压上升、视力急速下降、血压出现不规则波动的状况,我也告诫自己:坚持、再坚持。

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高效率、高品质的工作作风,与责编史美林女士的每一次沟通都使这部译著的质量提升。

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对区域国别研究的支持和投入,正因为此,这部中国学术界首部关于加拿大外交理论与实践的译著得以出版。

感谢此书翻译团队的每一位同仁。团队成员在经费少,翻译工作量计算不合理的科研体制下仍精诚合作、互勉互励,高质量地完成了翻译工作。此译著见证了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政治领域女性学者的精良学术品质。

最后,学人知识的有限性和语言转换的不完全对等性终将我们止于“完美”之门外,书中的翻译疏忽和错误都是我们的错,恳请各位专家、读者不吝赐教,以便再版时再做修订。

谨以此译著献给加拿大建国150周年!

钱皓

2017年12月1日于“丽都苑”

目 录

中文版序	约翰·J.柯顿	1
译者序	钱 皓	1

第一部分 外交理论:一种分析框架

第一章 导论	3
第二章 假设与原则	13
第三章 自由国际主义理论	37
第四章 边缘依附理论	78
第五章 复合新现实主义理论	98

第二部分 外交实践:加拿大对外政策

第六章 能力和行为	129
第七章 圣劳伦特、迪芬贝克和皮尔逊政府时期	153
第八章 皮埃尔·特鲁多和克拉克政府时期	178
第九章 马尔罗尼和坎贝尔政府时期	203
第十章 克雷蒂安和马丁政府时期	225
第十一章 哈珀政府时期	275
第十二章 贾斯廷·特鲁多政府时期	298

第三部分 外交决策:程序与影响因素

第十三章 加拿大外交政策制定中的政府过程	319
第十四章 加拿大外交政策制定中的社会因素	352
第十五章 加拿大外交政策制定中的外部因素	377
参考文献	402
附录	427

第一部分

外交理论：一种分析框架